

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史学家系列·李侃主编

班固评传

代良史

安作璋 著



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

· 史学家系列 · 李侃 主编

评传

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规划

史
家
列
·
李
侃
主
编

史
家
列
·
李
侃
主
编

一代良史

安作璋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史学家系列

班固评传

——一代良史

安作璋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8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5850219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柳州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4.75 印张 插页 10 107 千字

1996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3001—6000 册

ISBN 7-5435-2383-3/K·51 定价：10.30 元



班固画像

班
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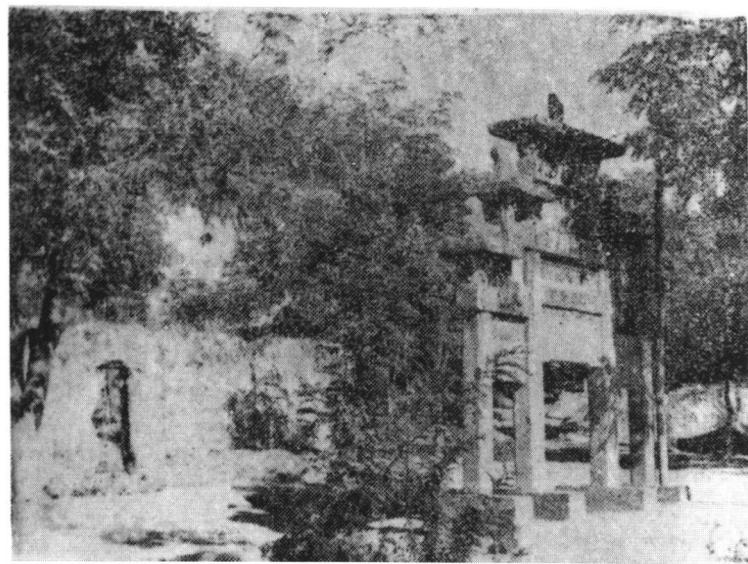


班固画像

孟堅漢書二十餘年始成。當世甚重其書。學子者莫不誦誦。范蔚宗謂其文贍而事詳。又稱其序事不激說。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云。



班固墓



班固故乡



班
婕
妤

詩品曰。婕妤詩其源出於李陵園前短章。辭旨清暢悠深。大約得四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班健仔
画像



班昭
画像

曹大家班惠班志略

惠班名明。一名姬。博學高才。達書世从无闻。著書未竟而卒。和帝招辟而成之。數召入宮令坐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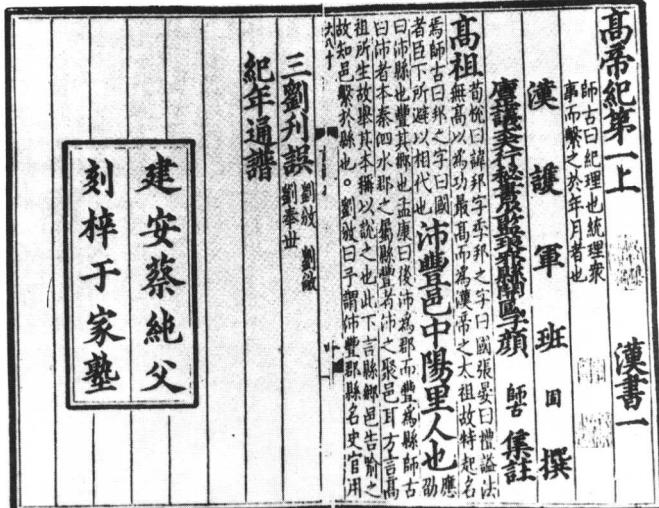
許慎入歸書焉。曉白大家。



班超画像



北宋景祐刊《汉书》



南宋蔡琪家塾刻本《汉书集注》

漢書卷一上

高帝紀第一上

高古曰：「紀理事而載之於年月者也。」

高祖：（一）沛豐邑中陽里人也。（二）姓劉氏。（三）母適：（一）嘗息大澤之陂。（二）夢與神

遇。（三）是時雷電晦冥，其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四）已而有娠，（五）遂產高祖。

（六）高後曰：「劉氏字季，吾之子曰劉，張良曰：『噲謀法無高』，以爲功高而爲漢帝太祖，故特紀名焉。」師古曰：「邦子曰昌邑，臣下所稱曰張良也。」

（七）高後曰：「漢高祖，劉邦也。」蓋漢曰：「後漢高祖而爲漢。」師古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縣號。」豎石：沛縣也。豎其鄉也。」蓋漢曰：「後漢高祖而爲漢。」師古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縣號。」

（八）高古曰：「出劉氏，而范增之族者又爲劉，因名爲姓。」

（九）文獻曰：「周及漢皆謂老父。」孟康曰：「謚，母別名晉侯老父。」師古曰：「謚，女老稱也。孟音是矣。史家不詳著祖母之姓，故承當時呼稱謚而音記之。其下王之屬，意義同。至如樊噲等，要引

謚記，好若謚傳，必以父母名字，若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事有劉姓木姓實存，史遷育不詳載？即理而可

高帝紀第一上

清王先谦刊《汉书补注》

天文志第六
補注齊召南曰：後志附帝使班固教漢書而馬融述天文志此志續所撰也。故曹志引凡天文以下五句角曰馬。

漢書二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凡天文在圖籍官之書自黃帝始

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

補注先謙曰開元占經引有石氏中官石氏外官甘

氏中官甘氏中外官漢成中官外以東西南北四官爲外

官也甘氏中外官常明者二百二十有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

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首武帝時太史令陳卓總

甘石至歲三家所著星屬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區

星以爲定紀儀衡震星數同隋志一千五百六十五星明志一千七百四十一五星

星爲定紀儀衡震星數同隋志一千五百六十五星明志一千七百四十一五星

星大一小分爲七等計一等十七星震星數同隋志一千六十九星

星三等十二星震星數同隋志一千六十九星

星三等二十四星震星數同隋志一千六十九星

星三等三十六星震星數同隋志一千六十九星

《白虎通德論》

白虎通德論卷第一

臣班固纂集

爵

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
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
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子爵稱也
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鉤命決曰天子爵稱也
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
俱命於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尚書曰天子
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以如帝亦稱天子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班兰台集》目录

班蘭臺集目錄

賦

兩都賦

西都賦

東都賦

明堂詩

辟雍詩

靈臺詩

寶鼎詩

終南山賦

幽通賦

遊居賦

覽海賦

竹扇賦

表

奏記
為第五倫薦謝夷吾表

奏記
東平王蒼

牋

與竇憲牋

又

《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

总 序

戴 远

中国传统文文化是一座宝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无数有益的东西。这其中包括加深对国情的了解、培养爱国主义情操，也包括汲取有益的政治经验、治国方略、管理方法，至于其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哲学智慧、科学思想则可以在更深层次上为我们提供借鉴和素材。

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是广大人民群众。一切文化现象都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活动中体现。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随着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形成了文化的不同门类。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覆盖面的拓展，文化的内涵日益丰富，在各门各类的文化活动中也涌现了各自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或者著书立说以成一家之言，或以自己的言论形成一种思想体系，或以自己的实践活动体现出一种文化精神。他们努力钻研，求实创新，把各个领域的思想文化步步推进，形成一个又一个高峰。这些文化名人如群星璀璨，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其数量之多真如恒河沙数。我们把这些明星贯穿成线，就构成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史。

广西教育出版社倡议编写出版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丛书，是一项有卓识有魄力之举，因此立即得到了各方面专家的响应，在几位著名学者主持下，分别组成各系列的写作队伍。由于作者大多长期从事有关方面的研究，因此很快完成了一批书稿。以作者队伍整齐，书稿质量高而言都是少见的。

本系列丛书没有采用学术著作的传统写法，也不对历史事实作子虚乌有的夸张演义，而是本着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对传主的活动作尽量生动活泼的叙述。作者的观点或通过分析评论表述，或者寓于史实的叙述之中。对于学术界有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则尽量融会吸收。

本丛书所拟定的传主选题，代表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各个方面，虽然各位传主卓然成家，足以彪炳史册，但却并非一定是完人。在他们身上既有耀眼的光华，又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历史和个人的局限，甚至不无糟粕。这与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是文化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在谈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时候要有清醒的头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称颂、肯定中国历史文化名人时，也要取这样态度。

最后，我要感谢广西教育出版社做了一件好事，感谢丛书的各位主编、作者和编辑付出的辛勤劳动。希望本丛书能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发挥作用。

是为序。

1994年5月

序

李 侃

尊重历史，编纂史书，是中国由来已久的优良传统。

古人有很多重视历史的精辟言论，如“彰往而察来”，“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以史为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等等。

正是由于对历史的重视，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才得以保存下来，并且代有创新，不断发展，也才能够使得在经过千百年之后，后人还得以从这些历史典籍中窥见以往年代的社会治乱、朝代兴衰、政教得失和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我们在接受、领悟这种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赐予的时候，对历史上那些优秀的史学家，不禁由衷地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心情。

中国古代著名史学家们在传统文化中占有独特的、重要的位置。这一方面，是因为史学家的职责作为文化领域的一种分工，是他人所不能替代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史学家工作的成果是反映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与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记载及依据。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之所以被完整地记载下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至今还可以脉络清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这是古代史学家的一大功绩。

在这套“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史学家系列”中，我们选择了8位有代表性的史学家入传，用以反映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及其在各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成就。这8位史学家是：司马迁（西汉）、班固（东汉）、刘知几（唐）、杜佑（唐）、司马光（北宋）、郑樵（南宋）、章学诚（清）、梁启超（近代）。

这8位史学家是包括从西汉到近代的史学家的代表，他们的著述和思想反映了中国历史典籍的多种体裁，反映了中国史学在各个领域包括历史记述、历史思想、史学理论、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史学变革与创新的辉煌成就。

司马迁著《史记》，创纪传体（综合体）通史，并以其深刻的历史哲学、生动的历史表述和以多种体例相配合，描述了自传说中的黄帝到西汉前期大约三千年历史大势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以及各阶层代表人物的言论、行事与历史功过。《史记》的伟大成就，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础。

班固受《史记》的影响而断代为史，著为《汉书》，开封建社会皇朝史撰述的先河。《汉书》中的10篇志，在典章制度史的研究和撰述上有突出的贡献。后人把《史记》、《汉书》尊为历代“正史”的开山之作。

刘知几以批判的眼光，自觉地对以往的史学工作进行回顾和审视。他著的《史通》一书，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在中外史学理论发展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杜佑重视史学的“经邦”、“致用”，所著《通典》一书，创典制体通史而意在“将施有政”。他是一位通晓政治的史学家，又是一位洞察历史的政治家。

司马光主编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叙战国到五代一千三百余年史事，旨在“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是一部“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的宏伟著作。

郑樵继承司马迁开创的通史家风，阐扬史学的“会通之旨”，所撰《通志》一书，是纪传体（综合体）通史，而其卓越成就尤在于《通志·略》，显示了他在典章制度、名物训诂、自然知识方面的造诣。

章学诚生活在考据之学盛行的乾嘉时期，而他治史的旨趣却在于理论的追求，所撰《文史通义》、《校讎通义》二书，

从理论上总结了 18 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明确提出“六经皆史”，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辨“史法”、“史意”之区别，论“史德”、“言公”的重要，发展了刘知几提出的“史家三长”说等等，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最高成就。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学上提出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先驱，他在 20 世纪初年提出的“史界革命”和“新史学”理论，批判了中国古代传统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对史学改革和创新起了开拓性的作用；他在本世纪 20 年代的历史撰述，涉及到历史研究的历史观、方法论的许多领域，在中国近代史学上有广泛的影响。

从司马迁到梁启超，这是一支宏伟的队伍，是一座丰厚的宝库，是一个优秀 的传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史学家的不同风格和特点，不同的成就和贡献，看出中国史学的连贯、繁富和成熟。

从司马迁到梁启超，我们能够列出有成就的史学家数以百计，他们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他们的贡献，可以彪炳千古；他们的传记，可以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之前的一部传记体的中国史学史。从我们所介绍的 8 位史学家的成就，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一部中国史学史，该是一座多么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的宝藏！

中国史学在两三千年的积累、发展中，不但造就了众多的优秀史家，也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这里，我只想说明两点。

第一，能不能创新的传统。

任何一个民族的史学，任何一个时代的史学家的思想和著作，都是一定时代和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后代史学和史学家对于前代史学和史学家，既有继承，又有批评，既有扬弃，又有创新。这种继承、批评、创新、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史学内容愈益丰富、体裁愈益

多样、范围愈益扩大、方法愈益完备、史观愈益进步，而终于走上科学轨道的过程。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学的历史迁延证明了这一点，而从古代史学到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进而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的转变，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任务是继承发展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科学事业。史学工作者在向这个科学高峰攀登的过程中，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反复的科学实践。这种探索和实践，绝不可忽视中国的历史特点和民族特点，不可忽视中国史学遗产给予我们的启示。

第二，是关注现实的传统。

中国传统的史学与每个时代的政治息息相关。从孔子因“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而“作《春秋》”开始，后世许多史家，虽各自的史学思想、政治见解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几乎都没有完全脱离政治、脱离现实，离开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治乱盛衰去空谈历史。至于近代中国的许多著名史家如魏源、梁启超、章太炎诸人，他们本身就是政治革新家、维新志士和革命志士；而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则是共产主义战士，历史学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专门的科学，同时又是维新和革命战斗的思想理论武器。尽管这个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历史内容和表现形式，但也有贯穿古今的精神本质，这就是史学家们对国家、民族命运和“世道人心”的关注，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这正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继承和发扬的优良史学传统。

盛世修史，继往开来。值“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史学家系列”推出之际，谨抱病以陈言，怀古贤，励今哲，翘首于后生。此乃一老史学工作者之赤诚也。

1995年7月